

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

巨人的跛足——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 发展研究

邹 蓝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

巨人的跛足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

赵宝煦 主编

郑继兵 李靖 副主编

邹蓝 著



中财 B0034242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08299

书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冯东海

封面设计：李 崧

巨 人 的 跛 足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

赵宝煦 主编 郑继兵 李 靖 副主编

邹 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6 14/16

字数：160,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7-02284-0/F·456

定价：4.30元

献 给

西部人和关心、热爱
西部的朋友们

《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序

赵 宝 煦

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已经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然而只有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才真正看到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曙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展，必然会同时引起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各种变革。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即曾明确指出：改革将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改革，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谓有中国特色，应该包含对中国优良传统的继承，同时也符合中国当前国情。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对中国国情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国情，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资源等自然条件，也包括该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国际交往、科教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条件。国情研究不应只是静态描述，更应注重动态考察。举凡历史上的脉络源流、当前的变化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都应该解析清楚。国情研究是一个纵横交织、复杂多面的系统工程。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很不够。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之后，由于改革实践不断提出要求，人们才逐

渐认识到国情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988年建立，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加强国情研究方面，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就是我们几年来研究工作的部分成果。丛书作者主要是中、青年学者。

限于水平，本丛书可能还存在不少缺点，从选题到著作内容，我们都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9月

目 录

西部或跛足〈代序〉	1
第一章 巨人的跛足——贫困的西部	7
1.1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7
1.2 经济发展的落后	14
1.3 生活水平的低下	30
1.4 文化、教育、卫生的现状	36
第二章 西部贫困的原生和继发因素	46
2.1 历史地位的变迁	47
2.2 自然条件的恶劣	52
2.3 地理的封闭	60
2.4 生态环境的破坏	66
2.5 观念的落伍	82
2.6 政策、制度的弊病	93
2.7 人才的匮乏	108
2.8 投资环境的不良	113
第三章 西部落后的宏观影响	121
3.1 东部和全国的发展受影响	121
3.2 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131
3.3 国土安全受到威胁	137
第四章 外国的贫困地区开发及启示	141
4.1 发展与国家干预	141

4.2	制度化的区域政策·····	145
4.3	“平等与效率”之争和“造血”与“输血”的区分·····	151
4.4	发展与环境保护·····	155
4.5	发展与文化遗产的保护·····	160
4.6	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63
第五章	西部发展及其政策的构想 ·····	169
5.1	制度化的区域政策及其实施机制·····	169
5.2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174
5.3	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188
5.4	改善基础设施·····	192
5.5	发展旅游业·····	198
结束语	西部的发展对全国发展的意义 ·····	205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著作目录	·····	210
封底的话	·····	216

西部或跛足〈代序〉

1985年8月，我以国际经济学者身份出席在兰州举行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时，绝没有想到我会写出有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这本书来。

更没有想到的是，1975年始对“边塞诗”的爱好，实际上决定了我今天的学术生活的轨迹。如果说1983年秋为了追寻岑参、高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笔下那种雄浑悲壮凄冷的西部情调而作的甘、宁、青之旅纯属出于浪漫蒂克的动机，那么接触到如此欠发达的西部现实后，浪漫蒂克的情绪则被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责任感所渐渐替代。几年来，虽然我多次往返于西部广袤的大地，把足迹印满天山南北、乌蒙山地、横断山脉和黄土高原，虽然我仍偏爱着西部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但我已不复再有那种浪漫的、猎奇的西部观了。小说家和艺术家面对着因封闭、穷困而得以保留的许多民俗习惯而赞叹不已，是可以谅解和理解的。而对于社会经济研究工作者来说，这种反应则表明一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即我们失去了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很欣赏瑞典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贡纳尔·缪尔达尔教授在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计划纲要》一书中的这句话，“经济学家以往从不是一开始就是经济学家，而近50年来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是经济学家。其结果就是，一个学生能当上经济学教授，而对他所研究的社会却只有一点最支离破碎的了解。”考虑到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而有某些经济学家（可能

为数还不少)只能在书斋中、纸面上解释经济原理、经济现象,一遇到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问题便马上束手无策时,我们自然也就理解缪尔达尔教授对其同行的这种讥讽的深意了。

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我有幸从事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有机会涉猎了国外的区域发展研究的文献著作,考察了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开发贫困地区的情况,并且曾与欧洲共同体的区域政策总司、区域发展基金会的专家有过交流。这种学术背景,使我在进入这一全新的领域时,不至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理解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现实。但是形成今天这样比较清楚的看法,却是多次到西部考察和多年坚持不懈研究的结果。

我自知对西部了解的还太少,于是自1985年的兰州会议之后,我抓住了每一个到西部考察、开会的机会,向同行讨教,在现实中求索。其“狂热”程度,可用一个事实来证明:1985年的兰州会议和1987年12月的贵阳会议,我都是自费参加的。

1986年11月,我随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和兰州大学的考察组,应甘肃省政府之邀在定西、陇南作了一些调查工作;1986年12月,我受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之邀,到云南昆明、大理参加了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科技进步的调查研究;1987年11月在贵阳、安顺举行的中青年学者理论讨论会,使我对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有了更深的了解;1988年6月至8月,我参加了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的新疆课题组,在乌鲁木齐、喀什、疏勒、奎屯、乌苏、独山子、石河子进行了广泛地调查研究;1988年9月,我受团中央之邀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东西互助协调会”;1988年10月至11月,我再度赴新疆,在乌鲁木齐、喀什、塔什库尔干作了一些调研工作后,经红其拉甫翻越帕米尔高原,循中巴国际公路考察巴基斯坦经济和与新疆及其它西北省区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可行性;1990年五、六月之交,我又有机会与昆明和贵阳的

朋友们交流了观点；两个月后，我急匆匆再赴兰州参加了“丝绸之路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当书稿完成时又赴河南焦作参加“欧亚大陆桥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

实地考察和研究，使我痛楚地意识到：相对于发达富庶的沿海地带即东部和中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这11个西部省区的3亿多居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8.57%），在中国领土的70%面积上，只生产出占全国17.21%的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701.6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85%，是东部人均水平的38.92%。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全国贫困线以下人口的70%^①。

以面积和人口计，中国是一个巨人。但是，支撑这个巨人的两条腿——东部和西部，只有东部这条腿还算得上是健康而有力的；而西部这条腿，我不得不把它称之为“巨人的跛足”。

常识告诉我们，跛足的人在奔跑时永远也别想竞争过正常人，巨人跛了足也不会例外。人们怎能指望一个拖着一条残腿的人轻快地跃进呢？

我国用于发展的资金本来就不足，而据对西部内蒙、新疆、贵州、广西、云南、宁夏6个省区的统计，在“六五”期间，其平均财政收入仅占支出的46.87%。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西部这几个省区入不敷出，另外50%以上的支出全靠中央财政补贴来支撑。

身为学者，我个人无力来治疗这条跛腿。但是，我愿尽我之能来诊断这条腿得病的先天和后天的原因，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条腿的病因所在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治疗时，病情的解除就指日可待了。在这方面，我倒是愿意做一个愚公。

① 郭凡生、王伟《贫困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贡纳尔·缪尔达尔作为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很重视人民大众的观念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西部社会经济的多年研究使我认识到，西部的欠发达，绝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西部的贫困以及我国现存的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即西北和西南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而且差距正在相对扩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例如某地贫困乡的果树硕果累累，主人宁可送人、喂猪，也不愿上市场去换回一定收入改善生活，因为经商在那里被视为“丢人”的事情。而各级政府的部分干预政策，因其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又强化了这些传统观念，起到了事与愿违的消极作用。某地农民宁肯躺在门外晒太阳也不愿去干活，他们明白因为共产党不能让人饿死，到时候救济粮、救济衣总会来的。这种心理正是“大锅饭”政策措施运作的环境劣化所致。当然，造成贫困与发展缓慢的，还有其它因素，诸如交通的不便、自然环境的不利等等，但这毕竟只是外部不利因素。只要存在着要求发展的内在冲动，人们总会自己设法改变这种不利条件的。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当人们心中不复再有这种积极提高自身、改善处境的冲动时，任何外来干预都会变得软弱无力。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大的障碍或许就是社会心理障碍。在传统观念的压抑、束缚下，偶然地个别地产生的变革冲动、发展愿望，往往未能达到一定强度而形成力量，便自生自灭了。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外来干预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因为各种政策措施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当执行人的传统观念与改革政策目标相抵触而发生衰减振荡（而不是无阻振荡或强迫振荡）时，我们又怎能指望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得到切实地贯彻和执行呢？

贵阳、安顺和路南、楚雄、下关之行，使我发现了“还原效应”和与之相反的我暂且以“示范效应”名之的现象。西南闭塞的

民族村寨中，外出学习、参军或参加劳务输出的青年人，在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能、新生活方式后，一回到故乡的原有环境中，则被迫放弃这一切而被传统同化；而在类似地区，因交通、通讯条件较便利，与外界交流较多，外出回归人员不仅未遭“还原效应”病毒的感染，反而对未外出人员起到了“示范效应”，使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极大的挑战。这种有趣的现象，令我深思，给了我许多深刻的启示。

于是，1988年，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并把这种想法付诸了实施。1989年下半年，我将初稿全面修改了一遍。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重新调整过的第三稿。

我想，这本书的读者，绝不应仅仅是研究西部问题或贫困问题的学术工作者，还应包括广大的实际工作者和对西部社会经济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因而我便不能用非常专业的术语、概念来阐述我的见解和观点。我力图用“科普”型的语言，来向读者介绍有关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国情”。

如果说本书能以一些常用的物理学观点、术语来解释某些社会经济现象，那么这是我要感谢中国科学院的青年物理学工作者田放同志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受益于1985年兰州“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和1987年贵阳“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会”甚多，因为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是这两次会议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此，我要感谢这两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在本书的酝酿和写作、修改过程中，我曾就某些观点和提法与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以及在京的朋友交换过意见。虽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是要感谢他们。我想他们会心领神会的。

我要对我的朋友杨利川和王润生表示谢意，有了他们的鼓励，

我才鼓起勇气把脑子里的思想变成了文字符号。

我更要对我的朋友石小敏和郑继兵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分别在初稿和第三稿时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建设性意见，使我避免了“当局者迷”的许多弊病。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本书得以面世，笔者实在应当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若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度，或许这本书还得再以手稿的形式“冷藏”些日子。

当本书付梓时，我将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在伦敦经济学院作的报告，即是从本书中抽出的内容。

承蒙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阿塔尔·侯赛因博士的关注和帮助，此书由我自译的英文缩稿，也将列入该校“讨论论文系列”出版单行本。对此我深受鼓舞，这可算是西部研究国际化的一个新起点。

这部书，是我自八十年代前期以来对中国西部问题研究的一个小结。我为此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但仍无法保证书中无不足甚至谬误之处。这些，理应由作者负责。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学术研究领域。唯其新兴，才使我敢斗胆在“前不见有人”的情况下，象卖瓜的王婆一样为自己作序。倘若“抛砖”能引来“玉石”，则西部有幸，中国有幸。

邹 蓝

1990年9月30日—1991年10月20日于北京西坝河

第一章 巨人的跛足——贫困的西部

“西部与少数民族地区是相对中国较发达的东部而言的。包括广西、宁夏、西藏、新疆、内蒙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陕、甘、青、滇、黔、川 6 省，共计 11 个省区。1986 年西部 11 省区共有人口 30,296 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8.6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5,400 多万，约占西部地区人口总数的 18%，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80% 以上。我们对历年来国民经济主要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西部 11 省区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国倒数十几位。1985 年占全国人口总数 28.57% 的西部 11 省区，仅创造了占全国 14.95% 的社会总产值，人均社会总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2.33%，为东部地区的 43.2%。同年西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仅分别占全国的 17.21% 和 17.16%，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7.85% 和 60.05%，仅为东部人均水平的 35.97% 和 60.05%。”

——中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组：《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

1.1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近几年，“西部”这个词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在各地区各阶层人士口中经常出现，在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际部门尤其如此。

毋庸讳言，“西部”一词的使用，有褒有贬，但是它的出现并且为公众迅速接受这一事实便表明，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西部”问题——即贫困地区发展相对缓慢、落后的问题，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所谓“西部”的地理含义，1985年8月举行于甘肃兰州市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作了近年来已为有关省区和公众接受的如下界定：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11个省和自治区，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70%。1987年的统计表明，这一区域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6.78%，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989.68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16%，是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10省市构成的“东部”平均水平的36.73%。

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1.1亿减少到1989年的4000万人。而西部贫困人口在全国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70%左右。同时我们不能忘记，1989年的200元所实现的购买力，比1985年要小许多，因而实际数字，我们还需考虑得更大些。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曾说，“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也很不稳定，一遇自然灾害，仍有10—20%的贫困人口饱而复饥，暖而复寒。此外，许多地区反映，在近年物价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即使人均收入达到200元，维持温饱也很困难，只能进行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1987年，甘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2.82元，居全国最后一位，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者占全部农户的27.01%，而1987年全国收入在200元以下农户平均数字为8.2%，1986年为11.3%。以此来推算，当年甘肃全省即有100万户左右，500万人在正常

年景尚不得温饱。

相比之下，1987年东部10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3.96%，却完成了全国54.38%的工农业总产值，其人均产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5.6%。

两相对照，这种差距是触目惊心的。如果这种差距仅仅是静态的存在，问题还不算太严重。关键在于，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增无减；而且由于西部农村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国民收入和产值的人均指标方面的差距，更是急剧加大，按照目前的实际发展趋势，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有效地加以控制，差距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呈加速度。这令人欣慰。但是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便是难题之一。

1984年，国务院对我国大陆上连成片的14个贫困地区作了明确的界定，其中位于西部省区的县份如下：

四川 涪陵、丰都、石柱、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

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北川、剑阁、青川、

旺苍、广元、平武、苍溪、万源、通江、南江。

筠连、珙县、兴文、叙永、古蔺、沐川、屏山。

陕西 略阳、勉县、洋县、城固、留坝、佛坪、南郑、镇巴、

宁强、西乡、安康、汉阴、镇坪、旬阳、石泉、岚皋、

宁陕、商县、丹凤、山阳、洛南、镇安、柞水、商南、

白河、紫阳、平利、汉中。

云南 石屏、红河、绿春、元阳、建水、个旧市、开远、屏

边、马关、麻栗坡、文山、砚山、西畴、丘北、广

南、富宁、弥勒、泸西。